

主编 李天纲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经济学（第二辑）

CHARLES FOURIER

合作先驱傅立叶

〔法〕查理·季特（Charles Gide）著 徐日琨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主编 李天纲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经济学(第二辑)

Charles Fourier

合作先驱傅立叶

〔法〕查理·季特(Charles Gide)著 徐日琨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合作先驱傅立叶/(法)季特著;徐日琨译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6

(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/李天纲主编. 经济学)

ISBN 978-7-5520-1160-9

I. ①合… II. ①季…②徐… III. ①傅立叶, C. (1772~1837) — 合作经济学 — 思想评论 IV. ①F01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5538号

合作先驱傅立叶

主 编: 李天纲

编 纂: 赵 炬

责任编辑: 唐云松

特约编辑: 陈宁宁

封面设计: 清 风

策 划: 赵 炬

执 行: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: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

责任校对: 笑 然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排 版: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

开 本: 650×900毫米 1/16开

字 数: 150千字

印 张: 10.5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1160-9/F.355

定价: 56.00元 (精装)

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(1873-1929)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(Mateo Ricci, 1552-1610)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，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(《灵言蠡勺》)、《形而上学》(《名理探》)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(文)、(历)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1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，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们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还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〔法〕查理・季特（Charles Gide）著 徐日琨 譯

合作先驅傅立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

王序

在初期合作思想史中，有處於支配地位的思想家二人，一爲羅拔·渥文（Robert Owen），一卽傅立葉是已。斯二人者，都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，同時又是啓發英法二國乃至其他歐洲各國的合作運動的主要人物。羅虛戴爾創始者（Rochdale Pioneers）之受渥文氏理想之衝擊，無倫矣。法國的工業生產合作運動，乃至消費合作、耕種合作，亦以傅立葉氏之啓示爲多；在當時雖無合作之名，而結社（Association）一辭，實爲傅氏思想全體系之中心。

傅氏所提唱之『潑藍奇』（Phalange）制度，實爲一最理想的合作組織，是一個以農業爲基本產業，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自給自足團體，以八百人或其倍數爲組成員，居一定的地域，有固定的建築物。此建築名曰『潑藍斯頓』（Phalanstère），是社員的共同的住宅，共同的集合所，與共同的食堂。蓋『共同生活，共同家計，共同住宅』實爲法輪齊制之根本目標也。在此理想社會中，各人最低限的生活均有保證，一方面不反對私有財產制度，他方面又謀社會財富的增加，各人都從事着愉快的勞動。這一個理想的制度，雖迄未能實現，可是此制所表現的一種自助互助的精神，和平改造社會的態度，與夫公平分配所得的辦法，都深深的影入後此從事合作運動者的心目中，而且將永遠成爲將來合作運動進展的最大啓示的。

綜觀傅氏之一生與其所及的影響，我不禁想到我國的合作導師薛仙舟先生。大凡一個運動的興起，必先有一二思想卓越的人物，出其高超特異的主張，爲社會倡。其先知灼見，在當時或不爲社會所重視，甚或加以訕笑，迨運動續有進展，而后始悟其啓示性之偉大者。民國八年，薛氏首先倡導合作運動，暢論合作之意義，於消費說尤力事闡揚，當時社會，除一二識者外，絕少注意之者。北伐軍興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，薛氏復起草

『全國合作化的方案』當時頗有非議其陳義過高者。今則我國合作運動已日就滋生，揆厥原因，則薛氏啓示之功，要爲不可滅也。

徐瑄山兄曩在法國專治合作經濟之學，於法國合作學說尤多所攻研，頃以所譯傳立葉傳全藁見示。原著者爲法合作名家季特教授，以名筆傳名人，其翔實生動，自毋待言。瑄山兄迯譯此書時，復屢獲原著者之指示。余信此譯本一出，必可爲我國合作運動增一偉大之啓示，而有助其進展，因率書所感爲之序。

王世穎序於爲爲齋，民國二十五年元月十五日。

彭序

傅立葉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，傅立葉的思想如何，傅立葉和合作運動及合作主義有什麼關係？讀者在看完吾山兄的這本譯文之後，就可以體會得到的，用不着我在這幾點上畫蛇添足起來，還笑大方。

但是既承譯者不棄，囑爲之序，又不能不寫一點。

到底寫點什麼呢？難道原著和譯本的價值還有我說話的餘地嗎？不佞沒有『獨具』的『隻眼』，說得恰當，只得得到一句那是顯而易見的批評；如若說錯了話兒，豈不更是弄巧反拙。

所以這裏只把傅立葉和著者的關係提出來，以就正於譯者和讀者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『我不願意人家因爲我印行了兩本和傅立葉表同情的書，就以爲我把傅立葉的學說完全接受了。其實并不如此；他的學說中有許多地方——他的唯物主義，他的理想社會的機構，他的非倫理的觀念，都令我看了生厭。不過我既是對於合作運動多久以來就有了濃厚的興趣，對於這位合作運動的先驅，這位合作運動的實現者——至少是紙上的實現者……的傅立葉，不能不表示同情……』

這是季特在他的那本傅立葉文選的第二版序言中的自白，已經輕描淡寫地把他和傅立葉的關係道出來了。

根據這段話的內容，我們知道季特和傅立葉兩人的思想，固有其相同之點，然而也有不能一致之處在。季特之與傅立葉，誠如布格累教授所言，他們兩人的名字是無從分開的。其所以不能分開的原因，并不是季特印行了兩本關於傅立葉的書，也不是季特把傅立葉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地位恢復了，而是季特的合

作主義的理論，有許多地方和傅立葉的思想相吻合，即是說傅立葉的思想，對於季特的合作主義理論之完成，有了很大的影響。

我們研究合作的人，都知道季特怎樣地攻擊寄生階級的商人，也知道季特怎樣地把消費者的朝統的口號提了出來。那末傅立葉在這兩方面的態度怎樣呢？

有人說傅立葉是商人的死敵。這話一點也不錯。他在年輕的時候，就當着顧客的面說他父親在生意上欺人。商人在他的眼中，是『不生長的，欺騙的，無惡不作的階級』。說是十分之九的商人和三分之二的運輸代理人都是無用的，即是說都是有害的。他的這種反商人的態度，都是事實造成的。當他在馬賽的一個商人那裏作工時，這個商人爲得抬高市價，把米積下不賣，致使在地窖裏腐敗了，而擔任將這些腐敗的米拋入海中的，正是他。至於巴黎和北山上兩地的蘋果價格之差，使他發明了熱情引力的故事，本書已經談到，用不着我在這裏說了。

消費者的保護，是季特的合作主義的理論重心。季特的這種思想，一方面固是受了巴士幾亞（Batista）的影響，但是巴士幾亞只使他在經濟學的研究中注重消費；傅立葉的以消費爲『潑藍斯頓』的中心底思想，以及『滑稽的君主是那被餓而死的君主』的說法，使他造成了他的消費者的朝統理論，使他設法把這個統而不治的昏君，變爲既統而治的明主。

季特不僅在這兩點上繼承了傅立葉，我們還可以找出旁的東西。

傅立葉要把這充滿着『上昇的仇恨和下降的蔑視』的現社會消滅，使每個階級都因親密的同意而融合爲一。大家都變爲富有，然而并不剝削他人。他以爲在他的『潑藍斯頓』中可以同時自然而然的實現最高的幸福，和最高的自由，因爲這個『潑藍斯頓』中，權力將是漸漸地沒有地位；即使有若干的權力留存

也將只是管理的，而不是統治的，即是說，乃是對物的，而非對人的，并且這裏的權力是為大家所賦與的，是用選舉產生的。不惟權力——這絕對的治人的權力不存在，就是共同規定的章則仍是一種『可恨的重負』，也是要不得的東西。我們應該讓個人的自由創意，盡量向前發展，不應加以任何的限制。同時傅立葉所倡導的結社，是由下而上，不是由上而下，而整個社會的改造，也是由下而上，不是由上而下。這樣的一種思想，如若可以稱為社會主義的思想的話，並不是集產的社會主義，而是聯合的社會主義。在這樣的一種社會中，人與人間既沒有仇恨，也沒有蔑視，只是利益的一致，生活的諧和。這個大同世界中的最貧者也終於看到『潑藍斯頓』時這樣說：『這是我的會堂，我的土地，我的房屋。』他以為這時不僅貧富，強弱，不致於發生仇恨，而且工錢制度也可以從此消滅。所有傅立葉的這些階級的融合，自由的結社，由下而上的組織，對物的管理而非對人的統治以及所有權的普遍化，工錢制度的消滅等等，沒有一樣不是季特在他的作品中所反復主張的，也沒有一樣不是季特的合作主義及現代的合作運動所服膺，所推行或者所已實現了的。就是季特和合作運動所醉心的和平主義，合作間的合作辦法以及國際貿易制度等等，也可以在傅立葉的思想中找出牠們的淵源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現在我們再進一步，來分析一下季特和傅立葉不同之處。

這裏且從傅立葉的新社會的機構說起。

傅立葉的新社會的機構中最使季特生厭的地方，大概是贏餘的分配，工作的熱情化以及分等的共同生活三者。

『潑藍斯頓』中的贏餘分配，為資本得十二分之四，勞動得十二分之五，才能得十二分之三。這是一種不

合於平等原則的分配制度，是季特所厭惡的機構之一。

傅立葉因他的熱情引力的『發明』主張人類的勞動應該完全由熱情去推動，即是說一切的勞動，都以滿足個人的熱情為條件。並且認為熱情沒有好壞之分，凡是熱情，都得設法利用。這種性善的主張，任情的主張，在季特看來，是要在倫理方面發生不好影響的。用這種方法去發展社會的生產，不僅是辦不到，而且有許多流弊。這是季特所厭惡的第二個機構。

傅立葉的共同生活，是家庭生活的消滅，是等級的消費。關於第一點，還因能够使消費趨於經濟化，合理化，并減輕主婦的家室之累，而有相當的利益；然而等級的消費，既是在同一地方，不僅不能解決階級的仇視，而且反引起階級的意識，使諧和的社會無從產生。這樣的理想社會的機構，又是使季特看了生厭的東西。

但是什麼是傅立葉的使季特難以接受的非倫理的觀念呢？

傅立葉最不願意有外來的限制。誠如季特在本書所說，他不僅不願意有物質的限制，身體的限制，政治的限制，而且不願意有道德的限制。連這種道德的限制也不要，季特認為是非倫理的觀念在那裏作祟。我們知道『潑藍斯頓』是由許多個團體所組成。這些團體之上，在傅立葉的意思，以為應該有一個女人，而這個女人應為其餘的男人——即團員所眷戀。他主張性的完全自由，愛情的絕對放縱。布格累教授說傅立葉的哲學是有系統的反節慾主義，正是指此。這種縱慾主義雖是在一個和『老處女』一樣的獨身生活者的傅立葉的思想上表示出來，還不免為季特所憎惡。

至於傅立葉的唯物主義，我們可以用他自己的這句話來說明：『如若奴隸時代的人們是為鞭笞所驅使的話，則自由時代的人們是為一張嘴巴所驅使了。』季特以為從口腹問題去了解社會問題，只是一種缺乏理想主義的可憎的唯物主義！

二五年二月，彭師勤於杭州。

譯者序

合作歷史中，有兩位最著名創立的先鋒，其一爲英人渦文氏，其二便是法人傅立葉；前者已盡人皆知而後者尙少窺其全豹者，其實對於合作立功而論，傅氏並不亞於渦文。

傅立葉所標榜的主義，目的即向合作方面進行，邵霍士（Jaines）說：『傅氏底社會主義，便是合作社會主義。』（註一）他之所以配稱爲合作先驅者，因爲傅氏最先提出『消費者被掠取』的那個大問題，並知道在

『澄藍斯頓』（Phalanstère）中聯合生產者和消費者之力，互相幫助，以解脫中間人的桎梏。（註二）

傅氏對於合作上的貢獻有兩點：第一，他宣佈募集合作資本底大綱，蓋無此，合作社便無從生存。第二，他對於合作思想底實行，係採取家庭經濟的方法，而能使社會有變遷之可能性。（註三）

此書係名聞世界的經濟學太斗季特先生的傑作之一，他受傅氏影響很深，而係最了解傅氏的一個人，因此，他說的話，自然都很可靠，至於文字的流暢，條理的清晰，猶其餘事。

若照書名看來，這本書似乎是一本傳記，其實內容卻詳述從事合作的實際經驗和方法，它含有啓發性，讀之可以鼓勵我們自動去試辦合作事業，而不專靠旁力的扶掖，它更對於社會切實問題，指出解決之途徑，如生活昂貴，住宅恐慌，家僕及農村借貸諸問題等，此均爲目下國人最感緊要而急待研究的，讀是書者，都可獲得滿意的答復。我譯此書之目的，不過希望在中國合作運動高潮中，加點小小底推波助浪罷了。

譯者執教於武林，平素課務魚鹿，祇在餘暇中譯之，可說是教書的副產品，譯時又很匆忙，未遑修飾辭句，但對於原意，大概不致違背的罷，倘蒙國內賢達，進而教之，實所盼望。

本書譯權係譯者前在巴黎晤季特教授時，承其特許，並允於譯竣之日，代作序一篇，今不幸書譯成而季師